

广州南方图书公司
天津人民出版社

组编

胡适

选集

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名家选集丛书

這是一件很有問題的文学史料，所以我要寫出我所知道的這幅圖畫的故事。

往往提到一幅
出即上照
(雪片)象
。這幅
片，題作「乾隆間王同鑄曹雪
曹雪芹小照」，有時竟
紅樓夢的書寫

曹雪芹小象的謎

胡適

天津人民出版社

胡适选集

胡 明 编选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选集丛书

胡 适 选 集

胡 明 编选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25印张 3插图 319千字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201-00425-5/C·52

定 价：11.20元

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选集丛书

出版说明

为了系统地搜集和整理“五四”以来我国著名社会科学家的代表性著作，向广大读者介绍现代社会科学家在各个学术领域方面的成就，以推动当代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发展，特编辑出版《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选集丛书》。

本丛书的编选原则是：

一、列选的社会科学家，要求是我国现代社会科学各学科或专业的奠基者、开拓者，或是在学术理论研究方面有创见、成就卓著的知名人士。

二、丛书所选收的社会科学家的著作，要求尽可能体现其生平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系有代表性的著作。对其长篇论著一般只节选其中的主要篇章。

三、本丛书初步拟定为五十种。每位社会科学家各编选一集，每集约三十万字。

书中有介绍本选集内容及特点的前言，以及对作者的生平、学术活动、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进行综合评价的述评或序。

本丛书是由广州南方图书公司和天津人民出版社共同组稿编辑的。

由于编辑水平有限，恳切希望得到各方面人士和广大读者的支持和帮助，为积累文化、传播科学理论做出贡献。

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选集丛书已出版的有：

《费孝通选集》 《马寅初选集》 《吴晗选集》 《顾颉刚选集》

《朱光潜选集》 《胡适选集》 《陈独秀选集》

目 录

编者前言	(1)
胡适学术思想概述	(1)
我的信仰	(13)
文学改良刍议	(38)
易卜生主义	(50)
不朽——我的宗教	(68)
《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三节)	(78)
杜威论思想	(84)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93)
四论问题与主义	(98)
新思潮的意义	(104)
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	(113)
研究社会问题底方法	(121)
《吴虞文录》序	(135)
校长启事	(139)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140)

文学革命运动	(156)
古史讨论的读后感	(174)
与陈世棻论中国教育史	(185)
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	(188)
《词选》自序	(201)
《白话文学史》引子	(207)
名教	(212)
请大家来照照镜子	(223)
人权与约法	(231)
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 ——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	(238)
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	(246)
《人权论集》序	(260)
欧游道中寄书(三札)	(262)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271)
我们走哪条路	(287)
司马迁替商人辩护	(301)
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	(308)
惨痛的回忆与反省	(314)
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	(322)
信心与反省	(331)
三论信心与反省	(338)
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还是教育	(345)
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	(350)
悲观声浪里的乐观	(357)

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362)
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	(367)
致罗尔纲信二札	(371)
自由主义	(374)
治学方法 (第一讲)	(381)
治学方法 (第二讲)	(393)
治学方法 (第三讲)	(406)
所谓“曹雪芹小像”的谜	(424)
胡适著作年表	(431)

编者前言

胡适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地位很高，影响很深。他的学术著述十分丰富，研究范围涉及社会科学许多领域。这里选收的四十六篇文章只是胡适学术著述中极少的一部分，但这极少的一部分却颇能看出胡适学术思想尤其是文化思想的一个基本轮廓。这些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篇章客观地反映了胡适在现代社会科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对于我们科学地总结我国现代社会文化的研究经验，合理的阐明我国现代社会科学的发展历史具有一定的认识意义。

本卷选收的文章按发表时间顺序排列，其内容范围主要着重在思想哲学、社会政治、中西文化、治学方法等几个方面，大抵笼括了胡适在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纲目与理论宗旨，在宏观的尺度上展示了历史上胡适学术活动的轨迹和思想演化历程。

下面分别作一个简要的说明。

胡适1931年写的《我的信仰》可以说是一篇学术性的自传，故放在卷首。

《易卜生主义》、《不朽—我的宗教》、《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新思潮的意

义》、《吴虞文录序》、《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自由主义》等篇是有关思想哲学的文章，集中体现了胡适资产阶级的哲学立场和思想态度。《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露骨的反马克思主义态度无疑需要深刻严肃的批判，我们这里之所以选收也正是为了体现胡适思想的历史原貌。需要指出的是，胡适在“五四”时代顽固地表现出来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态度实际上贯穿了他的一生。“五四”前后，胡适有很大数目的文章也有不可否认的抨击封建礼教，鼓吹思想解放的进步意义。《易卜生主义》、《不朽——我的宗教》、《新思潮的意义》、《吴虞文录序》等篇就是从几个不同方面表现了胡适崭新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对整个封建旧文化、旧道德的严重摧毁作用——这方面的曲直功过正有待于我们历史地、科学地作出评价。

《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欧游道中寄书》、《我们走哪条路》、《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悲观声浪里的乐观》等篇是社会政治类的文章，较完整地反映了胡适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社会思想和政治表现。在这种社会思想和政治观的指导下胡适对中国社会种种弊症下的诊断和开的药方有其复杂的、多方面的认识价值。比如，他在《我们走哪条路》里公开否定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必要，宣扬“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的所谓“五鬼”乃是真正的革命对象，严重歪曲那个特定社会阶段的政治性质和革命任务。这当然是荒谬的。但他在《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文中却又对国民党的独裁、训政、压制民主人权，摧残思想言论自由表示极大的愤慨，施予了痛切的斥

责，使我们看到了胡适政治观的另一面；《欧游道中寄书》记录了胡适对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曾经有过的肯定评判；《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一文中他还公开表示向1924年以来为“共产革命”，而慷慨献身的无数青年低下头来致最深的敬礼，认为他们所做的事业是为了全民族的解放，整个国家的自由平等和全人类的自由平等。——这些文章提供了一份有关胡适社会理想的新鲜材料。

关于中西文化方面的文章有《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请大家来照照镜子》、《信心与反省》、《三论信心与反省》、《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等篇，可以说代表了胡适在中西文化问题上的全部言论宗旨，是胡适文化思想的核心部分。这些言论对于我们今天在同一个问题上的探索仍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论述、介绍治学方法、研究方法是胡适学术著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胡适一生极重视哲学方法论的研究，尤其注意其在治学上的巨大效用，《杜威论思想》、《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致罗尔纲》、《治学方法》等篇正是介绍、传播方法论的代表性文字（其内涵并不全属实验主义方法论范畴）。

《治学方法》三篇全面地介绍了胡适自己的以考据为核心的治学方法的成功经验。到今天仍不失一定意义的参考作用。

此外，本卷还采选了文学研究文章《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运动》、《〈白话文学史〉引子》、《〈词选〉自序》等。胡适的小说考证成绩斐然，但这类文章已有选家与专集，这里只选了胡适晚年的《所谓“曹雪芹小像”的谜》一篇，从一个非常具体的考证实例显示胡适考证文章的风貌与骨力。《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是胡适历史

学方面较重要的宏观文字，单科历史的如《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与陈世英论中国教育史》、《司马迁替商人辩护》（经济史）等篇也有一定的代表意义。《〈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详赡地论述了“整理国故”的必要和方法——他的这个“方法”竟笼罩了国学研究界半个多世纪！《名教》对中国文化思想的一个方面进行了貌似戏谑却是精深的批判；《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还是教育》则展示了一个理智的学者对教育的炽热的、近乎迷信的感情；《校长启示》寥寥几句便揭示了欲将困扰中国的非常实际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控制人口，节制生育），——凡此种种，从各个角度反映了胡适在社会科学研究诸领域的思考成果和独立见解。

此上只是就选目作了大略的介绍，囿于目光识度难免有挂漏偏失之处。尤须指出的是，由于胡适坚持政治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和人民革命以及哲学立场、世界观的局限，选文中不可避免还存在一些错误的见解与提法（比如对农民起义、人民群众运动的敌视和污蔑性称呼、对少数民族的提法等）编者不能一一指摘和剔除了，希望读者在阅读中自行辨识与批判。——书后附有《著作年表》，读者如欲对胡适学术思想作深进一步的认识批判，可以寻索阅读。编者的《胡适学术思想概述》或恐对此也有一点点用处。

编者

1987.10

胡适学术思想概述

苏双碧

胡适（1891—1962年），原名洪骅，字适之，安徽绩溪人。在家乡念过九年私塾，1904年到上海，先后在梅溪学堂、澄衷学堂及中国公学就学。1910年赴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1938年出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4月起寓居美国，1958年回到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在中国近代史上，胡适是继梁启超之后最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学者，他先后获得欧美各国三十六个博士头衔。由于他是公认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又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他在学术文化的研究方面有突出的成就，在政治上又站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争取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学术行为和政治行为交织在一起，而政治行为往往要影响到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建树；因而在对胡适作出评价时，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都应考虑其中，离开政治行为去谈学术成就，或者抛开他的学术成就去批判他的政治行为，都不能对胡适其人作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胡适“暴得大名”是在新文化运动中，1917年，他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项文学改革的~~主张~~：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呻吟；五，务去滥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在对这八条解释和发挥时，他认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反对摹仿古人之作。为适应时代的需要，他极力提倡白话文，他说：“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这些主张对旧学的弊病产生了猛烈的冲击，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一文中，认为胡适是“首举义旗的”文学革命的“急先锋”。因为有陈独秀的支持，提倡白话文便有不可阻挡的气势。本来，胡适还认为提倡白话文“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可容“他人之匡正”。陈独秀在《答胡适之》中却认为提倡白话文“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的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这种坚决的态度，使反对者没有反驳的余地。陈独秀和胡适的紧密配合，使文学革命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开。随后，胡适又发表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强调“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要“用白话文作各种文学”，并将他文学革命的诸多主张概括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这些文章在当时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文学界影响很大。所以，郑振铎说胡适的文章是“最堂皇的宣言”。也正是这些文章使胡适声名大振。在这期间，他还提倡女子解放，呼吁社会自由，以及发展个性，这些都使他名副其实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

五四运动前不久，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出

版，这本著作由于采用了新的方法，表述了新的思想，颇受学术界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欢迎。出版两个月便又重版，两年内印了七次。它的出版以及它出版后的社会影响，使胡适的学术研究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至于书中的缺点和错误，人们大多未能顾及到。不过，成熟的学者，在看到这本著作的优点时，同时也看到其中的不足，梁启超就认为书中“对思想的来源抹杀得太过了”，“写时代背景太不对了。”又说它“时髦气味未免重些。”

胡适是杜威的信徒，受杜威的实验主义影响很深。他曾经说过，赫胥黎和杜威对他的思想“影响最大”，他在“留学日记”的序言中说，1915年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后来他在“自传”中又说杜威“更是对我有终身影响的学者之一。”杜威的哲学思想，胡适作了这样的概括：“（1）经验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对付周围的环境。（2）在这种应付环境的行为之中，思想的作用最为重要；一切有意识的行为都会有思想的作用，思想乃是应付环境的工具。（3）真正的哲学必须抛弃从前种种玩意儿的‘哲学家的问题’，必须变成解决人的问题的方法。”杜威哲学被介绍到中国来，正遇上中国的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正对各种旧的势力旧的思想进行冲击，而这种哲学恰恰鼓励青年不受陈规陋习的束缚，放开思想，探索新的问题，比较容易被青年所接受。但是，实验主义就其哲学思想来说是唯心主义的，就其政治思想而言，是主张一点一滴进行改良，反对革命的。当时，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正在扩大，马克思主义正在中国迅速传播，实验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冲突成为不可避免。1919年5月，《新青年》出版马克思主义专号，发表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7

月，胡适抛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指责谈“主义”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没有什么用处”。后来，接连又发表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直接攻击马克思主义，特别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认为这种学说会“使历史上演出许多不需有的惨剧”。与此同时，李大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反驳了胡适的观点，针锋相对地声明他“喜欢谈谈布尔扎维克主义”，并说问题与主义不能分开。这样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就展开了。胡适反对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但在二十年代，他还是站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一边的。到了三十年代初年，胡适创办《独立评论》，才站到国民党一边。

“五四”运动以后，胡适极力提倡“整理国故”。这里说的“国故”就是指“过去的文化历史”。对整理国故的意义，他有新的理解，他说：“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用明白晓畅的文字报告出来，叫有眼的都可以看见，有脑筋的都可以明白。这是化黑暗为光明，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化神圣为凡庸，这才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他的功用可以解放人心，可以保护人们不受鬼怪迷惑。”整理国故和疑古是联系在一起的。他说过去遗留的文化历史中有许多是“乱七八糟”的，“无头无脑”的“胡说谬解”的或“武断迷信”的。可知胡适的整理国故和疑古矛头主要是指向封建主义的，目的是“为中国学术谋解放。”他认为对中国古史材料应用要十分慎重，“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在给顾颉刚的一封信中概括了他的古史观是：“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轨道以后，然后用地下发掘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至于东周以下

的史料，亦须严密评判，‘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这段话的中心思想是写历史材料要绝对可靠，不能根据不可靠的史料写历史。郭沫若称胡适的这些主张是“比较新颖的见解。”当时疑古派钱玄同也指出对国学“辨伪”是要对圣人和圣经“裂冠毁冕”、¹“撕袍子”、“剥裤子”。“疑古”派受到封建卫道者的反对和不满也就可以理解了。

胡适整理国故，其实也就是对史料进行考证，胡适自己说有“考据癖”，他用“历史演进法”对中国古代小说进行考证。把小说分成两大类，即由历史逐渐“演变”出来的小说和“创造”的小说，前者以《水浒传》为代表，后者以《红楼梦》为代表。他通过对《水浒传》各种版本的搜集和考证，认为《水浒传》是南宋初年到明中叶“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结晶”。这个结论基本上是对的。胡适的小说考证用力最多的是《红楼梦》。在这之前，研究《红楼梦》的多以评阅批点为主，影响最大的索隐派，对《红楼梦》中的人物进行烦琐考证，企图通过这种考证来说明书中人物“隐”的是何人何事，结果是众说纷纭，越说越离奇，使《红楼梦》的内容情节成了“谜”。胡适的考证打破了这种“谜”，他主要考证了《红楼梦》作者的身世、版本，并得出结论，认为“《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甄贾两个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这个结论为顾颉刚、俞平伯等所接受，他们被称为红学派。应该说，胡适对《红楼梦》的考证，比起旧红学派来是有进步的。但是，胡适对曹家人事的考证也过于烦琐，同样有牵强附会之嫌。

在胡适的学术生涯中，对禅宗史的研究和重勘“水经注案”是值得一提的。他在讲授中国哲学史时，对禅宗的历史产